

中国农史研究丛书

农书·农史论集

胡道静 著

农业出版社



S-612
2

中国农史研究丛书

农书·农史论集

胡道静著

农业出版社

ZR59/08

中国农史研究丛书

农书·农史论集

胡道静著

农业出版社出版（北京朝内大街13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25印张 219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册

统一书号 16144·2887 定价 3.50元

農書と農史論集

胡道靜著
天野元之助題

自序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中，不但有汗牛充栋的历史学、哲学、文学典籍，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著作。科技古籍里面，农书、医书尤为大宗。还有一大宗是介乎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兵书（军事学古籍）。

1980年10月，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导主编的《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在北京举行第三次编写会议。24日那天，当时的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同志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怎样对待中国的农业历史遗产》的重要讲话^①，里面涉及了上述的对祖国文献遗存的综括与精辟的看法。瑞龙同志的发言说：“从科学的角度看，我国古代有三类最大的遗产：第一是农书，其次是医书，再次是兵书。这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不但很重视发展农业作为解决衣食问题的方法，而且还努力保护它和保卫它，以维持我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这些遗产，尤其是农学遗产，不仅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搞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必须珍视、利用、借鉴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总结、整理、继承和利用这份遗产，与国内外现代农业科学相结合，

^① 因为此文是论述祖国农业历史遗产的作用与意义的重要文献，故讲话原文经作者补充修改后，曾迭经各地报刊登载：（a）上海《文汇报》1980年11月24日《学术》版第71期，题为《正确对待祖国的农业历史遗产》（摘要）；（b）北京《百科知识》1981年3月号，题为《值得珍视的中国农业历史遗产》；（c）南京《中国农史》1981年试刊号，题为《正确对待中国的农业历史遗产》；（d）南昌《农业考古》1981年第1期，题同上。

为我们祖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农业改革，即中国式农业现代化服务。”

利用这份珍贵的科技遗产，首先需要查明家底。正是因为这三大古籍浩若瀚海，就有必要各做“簿录”式的先行工作，搞清楚历来农、医、兵书有多少著作？有哪些是已经失传的？那存留的有多少传刻、传抄、翻印以及注释、校订的版本？哪些稀有的仅存之本现在保存在哪里？等等。建国之前，农书的簿录工作有金陵大学农学院及金大图书馆合作，由毛骝等编著了《中国农书目录汇编》于1924年出版。兵书方面，有南京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委托陆达节编著了《历代兵书目录》六卷，于1933年出版。医书的工作，那时主要由日本的汉医学、医史学者做了，首先是丹波元胤的《医籍考》，继之是冈西为人^①在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进行的巨大的工作——《宋以前医籍考》，存留在我国的文稿在解放后由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58年予以出版^②。

毛、陆两书，著录项目简单，并无提要。日本学者有关中国医书书录两种，则备载目录学资料，尤以后者体例完善，辑录宏富。建国以来，国家制订“农、轻、重”的国民经济建设方针，发展农业科学研究，重视农学遗产整理，进一步做了摸清家底的普查工作，经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农业大学委托王毓瑚教授编撰《中国农学书录》，在1957年出版了第一版，又于1964年出版了增订本。《书录》的特点是搜罗更为广泛，并且著录的每一书，都由王先生亲自撰写了提要（介绍的文字），其作用就

① 冈西为人博士（Dr. Okanishi Tamito, 1898年—1973年），日本的药物学家、本草文献学者和中国医书目录学者。二次大战终战以前是沈阳东亚医学研究所中国医学研究室研究员。归国后是盐野义制药研究所研究员。冈西辑集的《重辑新修本草》（1964年台北中国医学研究所版）是恢复《唐本草》的最完善谨严的版本。

② 此书后来又由台北市古亭书屋印行一个版本。

远过于二十年代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确实达到“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准备工作”和“供农业科学工作者检查之用”的效果。至于古医书的家底清查事业，在日本学者已出的成果之上，再进行未完的和深入的工作，直至近年才由北京的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室担负起来。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我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1960年8月1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书局是整理出版古籍的机构，并无农业方面的任务。但是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考虑在本身业务的范围以内，做一些应当做也可能做的服务性的后勤工作，就提出按照目录学规范编制一部《中国古农书总录》的计划，并把这个任务托付给我去完成它。因为所领导同志认为，我在学术领域里是一个“两栖动物”，既从事于农业史的研究，也懂得点目录学。那时，所里派我代表书局去参加上海图书馆编制《中国丛书综录》的工作已接近于尾声。

《总录》和王先生的《书录》有什么不同呢？《书录》是一部精炼的著作。王先生对著录的每一部农书，根据大量的目录学资料，含英咀华，用自己的结论撰写提要，成为“一家之言”。《总录》则是直接提供目录学的原始资料以及汇集各部农书的作者序跋、刻书者序跋或题识、藏书者题跋的全部材料，是个辑录性的工作。但它是一次很大的结集，所利用的目录学原始资料，在《书录》的三倍以上，并且也附上辑集者的考证和按语。总之，《总录》是上循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谢启昆的《小学考》，下依《宋以前医籍考》的规范编制的一部“古农书考”——时间上起周代，下迄辛亥革命之前。加以在目录学资料之外，广从图书馆及私人收藏中采访未经著录或虽有著录而久未获见的农书。

所以在脱稿之前，《总录》著录种数已较《书录》约增二分之一。

每一农书的目录学资料入编体裁，举《齐民要术》为例，“著录”一项辑录《隋书·经籍志》、两《唐书》的经籍、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文渊阁书目》等，“提要”一项辑录《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百川书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简明目录》、《郑堂读书记》等，旁及《文献通考·经籍考》（因为它收录了南宋李巽岩即李焘写的《序孙氏〈齐民要术音义解释〉》一文），“版本”一项辑录《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四部丛刊书录》、《中国丛书综录》以及中外公私各家藏书目录中有版本纪录的文字；“序跋”一项辑录起自著者贾思勰序、宋绍兴十四年甲子龙舒郡斋刻本的当年四月十八日葛祐之序、明嘉靖三年甲申湖湘刻本的当年五月望日王廷相序、明《秘册汇函》本的沈士龙识和胡震亨识、清《学津讨原》本的张海鹏跋、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浙西村舍刻本的袁昶校刊叙和刘富曾的校刊商例，等等，下至罗振玉影印日本高山寺藏北宋刊本残卷的跋文。如此，作者著书的意旨、义例，成书的过程与流布的经历以及刊刻者的评价与考订（例如罗振玉跋中根据这个刻本避“通”字讳断言是北宋仁宗天圣中崇文院所刻^①），便能一编在手，历历可数。

元代王桢所撰《东鲁王氏农书》的“序跋”著录一项，从大德八年甲辰《抄白》（“皇帝圣旨里”）、皇庆二年癸丑作者自序、戴表元作《王伯善农书序》（从《剡源戴先生集》卷七录

^① 南宋绍兴刻本《齐民要术》葛祐之序说：“此书乃天圣中崇文院版本。”罗振玉检日本高山寺藏宋刊残本，内有避“通”字讳者。按宋朝避“通”字讳只有仁宗天圣年代（公元1023年—1032年）一个短暂的时期。盖此时刘太后听政，太后之父名通，因避通字讳。天圣十年十月太后卒，仁宗亲政，十一月改元明道，即撤去通字避讳。据此定高山寺藏本乃刻于天圣年间，正符于葛祐之所记的崇文院版本年代。

出）、明嘉靖九年庚寅覆刻元刊本前载的阎闾序及附载的山东布政使司刻书《移文》，到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福建重刻《聚珍版丛书》本的孙星华跋逐一录入。从《抄白》里使人了解到，由《农桑通诀》、《农器图谱》、《谷谱》组成的《东鲁王氏农书》在大德季年已完稿成书，它的最早刊本，是由元成宗铁木耳批准，旨下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司龙兴路（今南昌市）儒学教授司铎梓流布。自序作于皇庆二年，上距大德甲辰凡十载始铎讫。《抄白》又记江西儒学提举司上报王禔的行历说：“切见承事郎信州路永丰县（属于江浙行省，今为江西省广丰县）尹王禔，东鲁名儒，年高学博，南北游宦，涉历有年。”说明王禔在大德季年，年事已高，而为尹南方之前，亦曾为政北方。明嘉靖刻本载山东布政使司《移文》说“前元丰城县尹王禔”，则为“永丰”之误。由于元朝第一版本刻于龙兴路富州（原名富城县，亦称丰城县），为龙兴路的属州，《移文》以为旨下龙兴路刻，必因王禔官于富州（丰城）之故，致有此误。其实发刻地点，与建议刊刻地点有关，而与著者为官地点无关。虽则广丰与南昌相去亦非遥，然在元朝，丰城、永丰实分隶于两个行省。此仅赖得见《抄白》而明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称“王禔官丰城县尹”，系仍《移文》之误）。《抄白》载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我明代嘉靖九年刻本之首。国内各图书馆及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所藏的同一版本则均失去是项《抄白》二叶。当时由日本的中国农史专家天野元之助博士^①抄寄编入，其后天野翁亦录入其所著《中国古农书考》之中。

^① 天野元之助博士（Dr. Amano Motonosuke, 1901年—1980年）所著有《中国农业史研究》（1962年御茶の水书房版，1979年同书房印增补版），《中国古农书考》（1975年龙溪书舍版），《中国农业经济论》三卷（1978年龙溪书舍版），《中国农业の地域の开展》（1979年龙溪书舍版）等。

由于广泛索检公私藏书目录，已佚农书或可以追踪的农书名目，多有新的发见。前者例如在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史部“志剩类”中索出“金学曾《荆南植薯新志》十二卷三本”一条著录^①。这是王先生《书录》及任何论述番薯引种、栽培史的文字中所没有提到过的。后者例如在章式之（钰）的《四当斋书目》中索出孤本明人所撰《树艺篇》的著录，追踪而自北京图书馆的特藏中得之^②。

使用过的藏书志及题跋集，也颇有稀见之本，例如近人陈祺寿的《且朴斋书跋》等。又多索读书札记，如清洪颐煊的《读书丛录》、近人顾家相的《勸堂读书记》等。

还从大量的文集及笔记中搜录农书的序跋及记述。唐、宋、元人文集而外，曾使用过的明人集有张岱《琅嬛文集》、陈继儒《白石樵真稿》，清人集有叶昌炽《奇觚觚文集》、李祖望《锲不舍斋文集》等。笔记中少见之本有清潘祖荫的《八桂斋随笔》、今人张宗祥的《铁如意馆随笔》等。

这一工作进行到第七个年头即1966年初夏的时候，积稿已有一百多万字，接近完成的阶段。文稿堆地，高与桌齐。不幸这时“十年动乱”开始，我遭“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陷害，坐了九年牢狱，家人都被株连，方在初中读书的次子也被“里弄专政队”强暴绑去，横加迫害。家庭分崩离析，所有文稿及图书资料，尽在这场大动乱中丧失无遗。平反以后，组织上助我追寻被抄掠的文稿，久无片纸之获，因为是被残暴的“专案组”悉付一炬了。

① 此书当为金学曾为官江陵之时倡导栽培甘薯的纪录。原文“薯”作“署”，肯定是误脱了草字头。所以作这样的判断，一因它是金学曾的著作，二因“植署”文义不通。金学曾乃明代推行种薯的名家，当其任福建巡抚时，因鼓励种薯收到救荒的效果，这种新的作物因而被称为“金薯”。

② 参看本书《钞本仅传的一部农学文献汇编——〈树艺篇〉》。

遭到毁灭的文稿，除《中国古农书总录》外，还有《梦溪笔谈补证》稿约有四十万字，这是我在《梦溪笔谈校证》出版以后继续为沈括科学名著所做的校理、注释的工作。又有为北京中华书局《知识丛书》写的《中国古类书》稿以及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辑录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状校录》、《苏沈良方校录》、《沈存中佚书钩沉》（其中包括《灵苑方》、《梦溪忘怀录》、《清夜录》和《长兴集补阙》）、《熙宁字说钩沉》等。

拨乱反正以后，我得到党的关怀，重新恢复了学术研究的生活。寸心感激，鳃鳃图报。但是病弱之躯，精力衰竭，已非昔比，所以对于剩余光阴，应作如何部署，不能不从长考虑。感于过去战线太长，不可再蹈覆辙，只能集中有限的时间与精力，重新撰集《梦溪笔谈补证》一书。《总录》巨帙，断非再能顾及，只好留给有心的同志成此大业；如果由有关的单位承担，那是更好。即农史研究我也打算撤出阵地。王毓瑚师原谅我前一打算，而对我后一打算则表示坚不同意，说“中外都不允许你这样想。”使我深感惶悚。农业出版社朱洪涛同志于是向我提出一个建议，即首先把我过去发表过的农书与农史的论文编印一本集子，作为重理旧业的纽带。这些文字散布在各种刊物之中，我自己手边也一无所存了。它们写得都不成熟，学术价值并不高。由于农史界有时还需参考，我自己要找阅也很困难，所以感觉洪涛同志的想法是可取的。汇印一集，再一次得到学者与读者们的批评和绳正，那也不是一件坏事。

在收拾成书的过程中，老友陈左高同志费了不少心力，把我所回忆到的篇章都一一设法寻索到了，并且通读一遍，助我校正疏忽之处。丘冬生同志、焦宛珍同志、胡萍同志帮助抄校，因得缮出清稿，深可感谢。但至写序之时，宛珍同志已因病去世，不胜

悼念，在此特向冬生同志谨表慰问。还有我那横遭迫害的次子，元端被关押了十年，坐牢比我还久，直至获释，也只有初中的文化程度，但他要求学习着抄一两篇稿，说是用实际行动来回击“四凶”毁灭学术文化、破坏法制民主的暴行，那么也遂成了他的心愿。

我还要十分感谢三联书店的范用同志和董秀玉同志。这是一件奇遇。本书中的《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及其总结农业技术经验的三个阶段》一文的初稿，是经过十年动乱由他们两位保存下来并且为我找到的。1965年，天津大学历史系李光壁教授为三联书店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续编》一书，征文及我，我在1966年春初写好此文寄去。运动既起，一切停顿。光壁同志在动乱中遭迫害去世，我认为此稿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无可稽查了。偶与秀玉同志谈起，她认真地汇报给范用同志；竟然在三联的积稿中清理出光壁同志当时转去的此稿。如果它当时在我手边，那肯定也被“四凶”爪牙搜去，悉付一炬了。这个意外的保存，使我能把它修改补充后也收进这本集子。

然后还要抱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和感谢为本书封面题签的日本天野元之助老博士。天野翁研究中国农业历史的成就，在举世科学技术史界闻名。他老人家待我极好，殷切通问，恳挚教导，雁书往还，无虑百通。1963年，他的巨著《中国农业史研究》得日本学士院（科学院）奖金，由日皇裕仁亲授，我特致电祝贺。1966年冬，他访华抵沪，谋一晤面。时上海局面已乱，我虽尚未被投狱，已失自由。他回国后仍有信来，不能得复。可是每逢年终，他总是寄一张贺年片到我家中，从不间断。至于寄来他的新著《中国古农书考》则遭“没收”，至平反后也未能查还。我出狱那年，回寄贺年片一张，他大喜过望，因为他已隐约听到一种传说，讲我因受迫害已经死去。此后音讯重通，当他知我实曾坐“四人帮”的牢，罪名之一是“里通外国”，当了日本的

“特务”，来信笑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夕，他也坐了日本宪兵队的牢，罪名是当了中国的“间谍”。无独有偶的“莫须有”的冤陷，使人不能不感觉到：“四人帮”在那里用自己的手把自己同日本宪兵队之间划上了一个等号。

天野翁闻知农业出版社准备把我的《农书·农史论集》出版，高兴地给我题了封面。这是两国之间学术交流以及他与我深厚友谊的可贵的见证与纪念。可惜我经常患病，动作迟缓，不能及早把稿整理完竣，拖延了问世时间，以致天野翁不能见到本书的出版，而因年事过高得病在1980年9月去世。我非常抱憾地在此向天野翁的公子悦夫博士（日本国立遗传学研究所）和爱女和田恭子夫人深表自谴的心情。

上面讲的这些也反映了一个对立面：有少数人千方百计想把人类的文化毁灭掉，而更多的人则甘愿尽一切的努力为维护与拯救文化而不懈地做出贡献。我的这点剩留的论文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连这点东西也得到这么多的鼓励和支持，使我亲身感受到正义力量带来的光明与温暖，那么，那种巨大的、真正的、进步的人类文化，更不在话下，其不能被黑暗势力所吞噬也必矣。

最后，还要说明一件事。我失去了《中国古农书总录》的全稿，还剩下这些曾经发表过的农书与农史的论文。我又失去了《中国古代的类书》一稿，也剩下一些发表过的论述我国古类书的零星篇章，它们同样有点参考的用处，而且对于使用古类书来寻检资料的农业历史学者来说，也能起点从旁解释的作用，所以就把四篇“类书解题”稿附载于后，统请读者惠予指教。

胡道静

1981年2月记于劫后海隅文库。

目 录

自 序

稀见古农书录	1
稀见古农书别录	14
读《四时纂要》札记	26
沈括的农学著作《梦溪忘怀录》	28
今本《南方草木状》的几个问题	36
《种艺必用》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	43
《种艺必用》内容的渊源	54
述上海图书馆所藏元刊大字本《农桑辑要》	57
钞本仅传的一部农学文献汇编——《树艺篇》	69
徐光启农学著述考	74
徐光启的农学著作问题	97
朝鲜汉文农学撰述的结集	99
我国古代农学发展概况和若干古农学资料概述	114
释菽篇	131
梁为周氏族所植粟之优良品种说	138
茭白园艺改革的时代和地点	145
古代瓜类考	150
山东的农学传统	157

沈括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和贡献.....	160
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及其总结农业技术经验的三个阶段.....	175
关于“《农业史话》编写提纲(草案)”的一些初步意见.....	214

附编 类书叙录

《艺文类聚》解题.....	224
元至顺刊本《事林广记》解题.....	236
读影印本《永乐大典》记.....	253
《古今图书集成》的情况、特点及其作用.....	262

稀见古农书录

分门琐碎录

上海图书馆善本部最近收到一种旧抄本书，题名为《分门琐碎录》，一册，共五十七页，不著撰人名氏。写录的时代，审定在明末、清初间，但它却是一部掩埋已久的南宋初年人的著作，而且是一部在农学史上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古籍。研究祖国农学遗产的同志们，以前都不曾见到过这部著作。

内容情况 这本五十七页的《分门琐碎录》，每页十八行，行二十至二十二字。卷首有“秀水计氏珍藏书画”一印。内容分农桑、木、花、果、菜、禽兽、虫鱼、牧养、饮食九类。农桑类下又分谷麦耕种总说、五谷总论、谷、麦、种麦法、麻豆、桑、种桑法、柘、养蚕法、种艺等小类，木类下又分木总说、种木法、接木法、木杂法等小类，花类下又分花卉总说、种花、接花法、浇花法、花木忌、杂说等小类，果类下又分果木总说、种果木法、接果木法、治果木法、果木忌、杂说等小类，菜类下又分菜总说、种菜法、种杂植法、杂说等小类，禽兽类下又分鹤、雁、诸禽、虎、驼等小类，虫鱼类下又分虫、鱼、蟹等小类，牧养类下又分鸡、鹅鸭、马、羊、猪、犬猫杂说、医兽等小类，饮食类下又分曲蘖、酝酿、烹饪等小类。

本来是一部类书 以上内容来看，这部书当然是一部农学著作。不过，书名却有些可怪。称做“分门”犹有可说，为什么